

#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sup>\*</sup>

马保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宋国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

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 20 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岳岗和于庄三村之间,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30',北纬 34°38',海拔约 105 米。遗址位于索须河南岸台地上。地势北部较高,向东、南逐渐降低。遗址东西长约 500、南北宽约 300 米。1985~1990 年期间进行过调查和试掘,发现这是一处与郑州商城密切相关的商文化遗址<sup>[1]</sup>。1995 年、1999 年和 2000 年,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小双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有刻划符号的陶器,经我们初步整理,共有 48 件,其中绝大多数尚未发表<sup>[2]</sup>。这些符号多刻于泥质灰陶的口沿面,另有一部分刻于夹砂褐陶、夹砂红褐陶的外壁和器底。刻有陶符的陶器种类有盆、豆、大口尊、缸、簋、罐、瓮、钵、壶等。陶符可以分为目形类、矢形类、三竹叶(草叶)形类、“十”字交叉类、一至四条平行短线类及其他诸类。现将这批陶符资料介绍如下,并作初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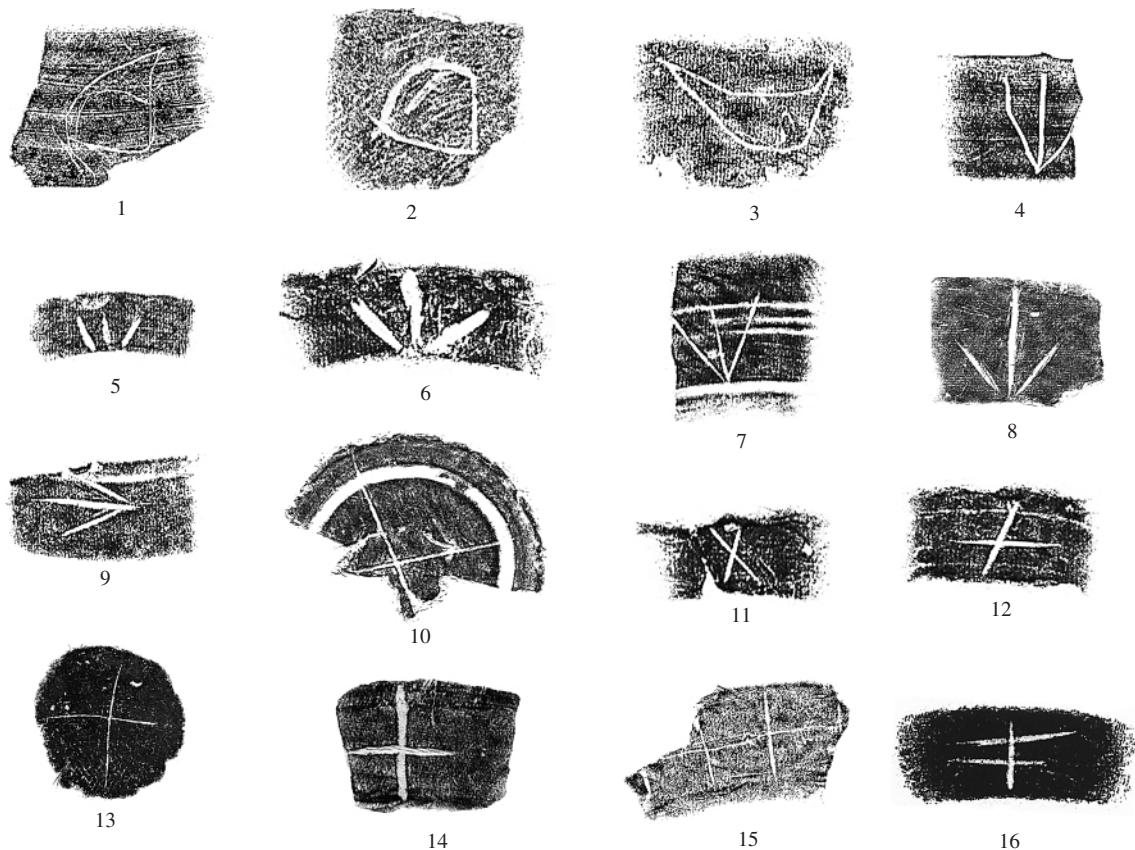
## 一 目形符号

陶缸(99ZXM20:09)腹部器表陶符像是一个目形(图一:1)。眼睛的虹膜(指白色背景上有色的圆环形部分,不同人种颜色有所不同)

上边没有与上眼眶连合,所以可能表示俯视的眼睛,而观测者应当是仰视。陶缸(99ZX T203③:02)腹部器表陶符似乎也是一个目形(图一:2)。另外,陶缸(99ZX H42:26)腹部内壁陶符像是没有刻划虹膜的俯视眼睛(图一:3)。

从构形上看,由于陶缸(99ZXM20:09)上的目形有完全闭合的眼眶构形,而且眼眶内有借助眼眶下部笔画和一个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成闭合形体表现瞳孔及虹膜形状。由于是用线条来组构成一定的形状,所以它是一种线条造型类刻符。早在北宋《博古图》中,就已经把诸如“”、“”形的符号释为“目”字了。吕思勉在谈到象形字形体演变时指出:“今(目)字破字之作|,而又纵书之,则全不像。昧者误以一画为象瞳子(即瞳孔和虹膜部分),乃说为重瞳子矣。”<sup>[3]</sup>这就指出了象形的“”到“目”字的转变过程。到目前为止,目形符号已发现数例。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出土陶罐(M706:10)上的彩绘符号,该符号“上部横画巨目圆睛,眼角向下卷曲如勾喙”<sup>[4]</sup>。吴城文化的江西清江(旧称樟树)吴城遗址出土过相当于商代早中期的陶符<sup>[5]</sup>,其中泥质黄釉陶罐(74秋 T7⑤:46)肩部的陶符“”亦是目形。又吴

<sup>\*</su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基金项目(10YJA770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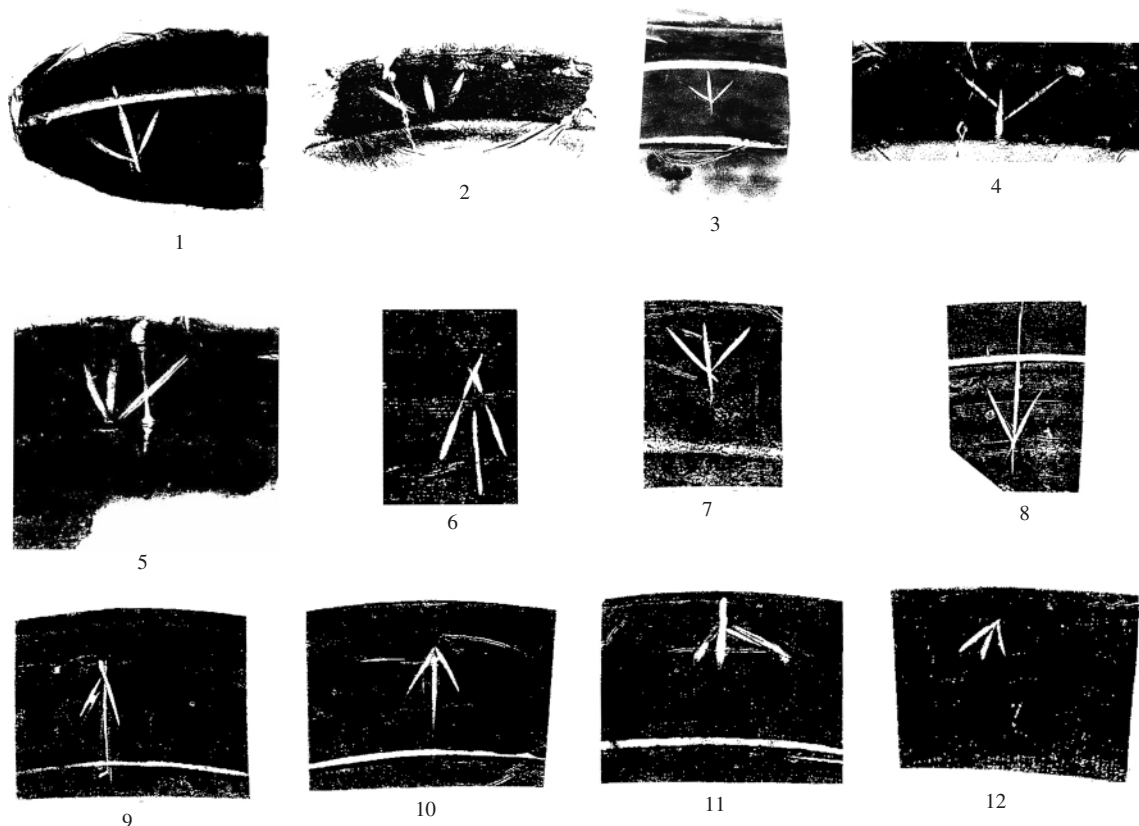
图一 目形、三竹叶形、“十”字交叉形陶符

1. 缸(99ZXM20:09)腹部器表 2. 缸(99ZX T203③:02)腹部器表 3. 缸(99ZX H42:26)腹部内壁 4. 缸(99ZX T132④:12)口沿器表 5. 豆(00ZX T135④A:529)口沿沿面 6. 豆(00ZX T135④A:544)口沿沿面 7. 罐(00ZX T97④A:183)肩部磨光处 8. 盆(00ZX T129④A:54)口沿沿面 9. 瓮(00ZX T135④A:390)肩部 10. 缸(00ZX T129③:03)底部阶侧 11. 豆(00ZX T135④A:528)口沿沿面 12. 豆(00ZX T53H60:64)口沿沿面 13. 缸(95 T194④:2)底部 14. 盆(00ZX H96:9)口沿沿面 15. 盆(99ZX H63:9)口沿沿面 16. 豆(95GH03:3)口沿

城遗址所出泥质灰陶钵(74秋T7⑤:51)上有一“𠃊”形符号,可能也是目形,唐兰认为有些像“角”形,也有些像“目”形<sup>[6]</sup>。另外,此遗址所出陶孟(74秋T7⑤:60)底部有“𠃊”形刻符,似乎是没有刻划出虹膜的目形。郑州南关外商代前期偏早遗址出土陶片(C5T95:158)上有一个目形刻符“𠃊”<sup>[7]</sup>,左边稍残。郑州商城遗址市法院内出土大口尊(ZFH1:46)口沿内侧刻划有目形符号“𠃊”<sup>[8]</sup>。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亦发现两例目形陶符,一例作“𠃊”形,刻划于黑陶簋(T10:095)口沿部,季云认为此符号已经是陶文,可释为“臣”,亦可释作“目”,但考虑陶器唇上的文字多为横书,释作“臣”似

更合宜;一例作“𠃊”形,一端稍残,施于不知器形的残陶片(T7:020)内侧,季云认为字似为“鱼”,卜辞和商代铜器铭文中的“鱼”字都是象形的,其首向上,身直垂,而此字则作游动之形,没有把鱼鳞清楚表现出来<sup>[9]</sup>。我们认为此陶符也有可能是目形,只不过眼眶内表示虹膜的左右两笔略显直了些,这和郑州商城遗址市法院内大口尊上的目形类似。

上述几例目形陶符,其构形方面均与贾湖龟腹甲(M344:18)的目形刻符<sup>[10]</sup>雷同,都属线条构形类。在时代上,基本上见于夏商时期。其中吴城遗址陶器、郑州商城遗址市法院内大口







图二 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发现三竹叶形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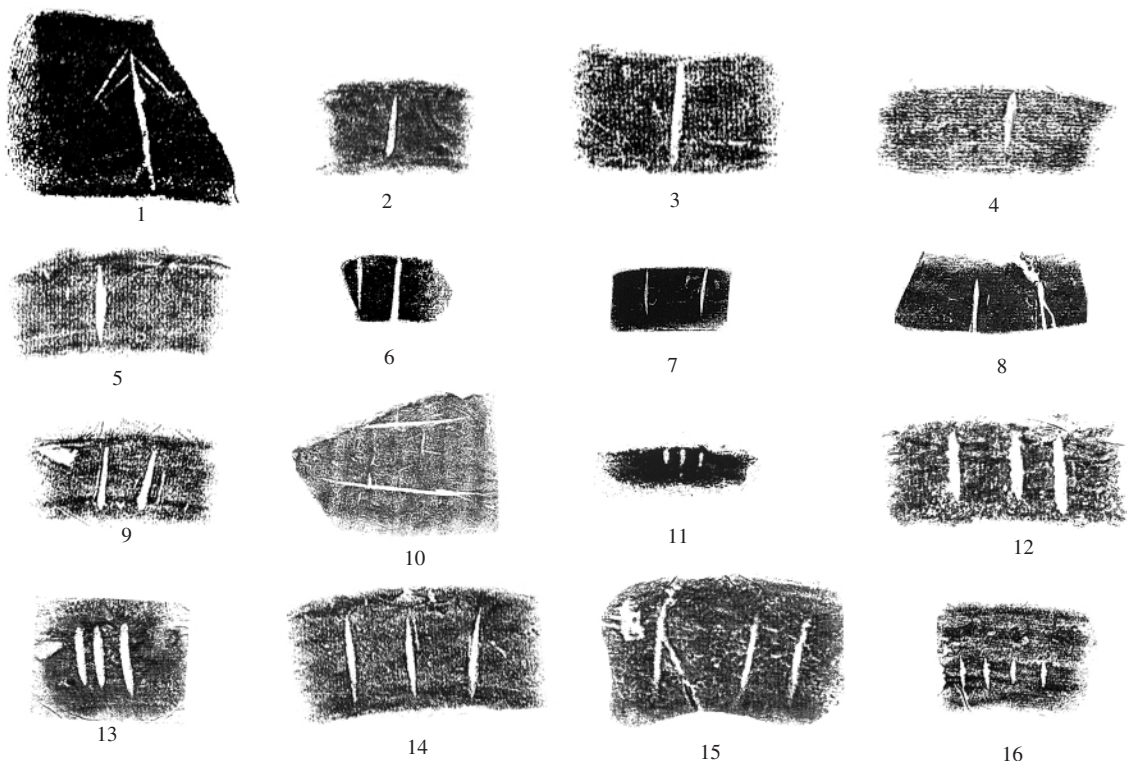
1. 大口尊(97ZSC8 T158⑤:1)口沿内侧 2. 浅腹盆(97ZSC8 T158⑤:2)口沿 3. 浅腹盆(97ZSC8 T158⑤:3)口沿  
4. 浅腹盆(97ZSC8 T158⑤:4)口沿 5. 浅腹盆(97ZSC8 T158⑤:5)口沿 6. 缸(86YS T19H27:12)器表 7. 浅腹盆  
(92YS T48H150:1)口沿 8. 浅腹盆(92YS T41-46H159:3)口沿 9. 浅腹盆(83YS T1③:57)口沿 10. 缸(83YS T1  
水下:62)口沿 11. 缸(83YS T3③:25)口沿 12. 缸(83YS T4④:1)器表 (1~5为郑州商城遗址出土,6~12为偃师商城  
遗址出土)

尊、小双桥遗址陶缸上的目形刻符都是借助上下眼眶或再加上适当的笔画表现眼眶内的虹膜部分,而大甸子遗址陶罐、郑州商城南关外陶片上的目形陶符,它们的虹膜部分是独立构成的,只不过大甸子遗址发现的目形陶符的虹膜上下两边是与眼眶重合的。另外,有的目形陶符是可以分出左右眼的,如郑州商城遗址法院内发现的目形陶符似乎可以判断为左眼,而小双桥遗址陶缸(99ZXM20:09)腹部和藁城台西黑陶簋口沿部的两例目形陶符,似可以判断为右眼,特别是小双桥遗址发现的这个目形陶符,眼眶的上边左端笔画弯曲向下延伸,而其左边又有一条上下斜置的笔画,似乎暗示的

是眼眶和鼻子根部的界限。




## 二 矢形符号

陶盆(95 G3:25)口沿上的陶符,像是矢形(图三:1)。在早期刻划符号中,矢形符号是比较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矢的使用很早,同时也说明不同区域或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人们都有使用矢的事实。比较典型的材料如二里头遗址陶符“”<sup>[11]</sup>、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符“”<sup>[12]</sup>、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陶符“”<sup>[13]</sup>等,只不过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陶符的尾部有分叉的、起平衡作用的羽毛或其他东西。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紫红色细砂岩片(75T8②:856)上的符号“”<sup>[14]</sup>、








图三 矢形、一至四条平行短线陶符

1. 盆(95 G3:25)口沿 2. 簋(00ZX T47④A:114)口沿沿面 3. 簋(00ZX T135④A:427)口沿沿面 4. 盆(00ZX H37:7)口沿沿面 5. 盆(00ZXT135④A:417)口沿沿面 6. 豆(95 H55:8)口沿 7. 大口尊(95GH02:10-1)口沿内壁 8. 豆(95GH02:10-2)口沿 9. 簋(99ZX H31:13)口沿沿面 10. 大口尊(99ZX T283④B:5)口沿内侧 11. 钵(95GH03:1)口沿内壁 12. 瓮(00ZX H102:14)口沿沿面 13. 盆(00ZX T93④B:134)口沿沿面 14. 簋(00ZX T97④A:122)口沿沿面 15. 盆(00ZX T137③:013)口沿沿面 16. 盆(99ZX H63:12)口沿

陶罐(74秋ET2④)肩部压印符号“<sup>[15]</sup>,两者皆似箭镞,后者更加突出了箭镞的棱角。上海马桥遗址发现的“”形陶符<sup>[16]</sup>,可能也和矢形有一定的联系。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发现的“”形陶符<sup>[17]</sup>,似某种植物的叶子,又似箭镞或羽毛之形。另外,不少单线条的、线段构架类的符号“个”是否也是矢形的不同表现形式,还可以再讨论。如吴县澄湖遗址发现的陶文“个”<sup>[18]</sup>。甲骨文中“个”形的字(《合集》35273),似乎与箭镞在形体上有些类似。

### 三 三竹叶(草叶)形符号

小双桥遗址共发现6例三竹叶形符号(图一:4~9)。从这种符号多次出现的情况判断,小双桥遗址的先民们一定和这个符号所代表的

事物有密切的关系。类似的陶符资料在其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只是在形体上稍有异同,其三叶开口的方向或朝上、或垂下、或横出左右。如临潼姜寨遗址“”形陶符<sup>[19]</sup>,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形符号<sup>[20]</sup>,大溪文化宜昌扬家湾遗址“”形陶符<sup>[21]</sup>,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形陶符<sup>[22]</sup>,陕西绥德县小官道遗址“”形陶符<sup>[23]</sup>,二里头遗址“”形陶符,以及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此类陶符<sup>[24]</sup>等。此外,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缸、浅腹盆及1997年郑州商城第八区宫殿区第二小区158号探沟第5层出土的大口尊、浅腹盆上亦有此类符号<sup>[25]</sup>(图二)。殷墟陶器刻符也有作“”、“”、“”、“”等形的<sup>[26]</sup>。可见此类符号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代非常多见。

王志俊认为,刻符“”,似为“中”字,“中”



字甲骨文作“𠂔”(《京津》4047、《京都》2037);金文作“𠂔”(𠂔盂、作父戊簋);《说文》作“屮”,读若徹,草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茎也<sup>[27]</sup>。于省吾也认为这个刻符可作“艸”<sup>[28]</sup>,即草字。我们认为,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类符号就是后来汉字中的“草”字,但是单从形体上看,它们像是刚破土而出不久的禾苗,或是小草、树叶等形状,所以它们可能代表某种植物之幼苗或树叶的含义。

#### 四 “十”字交叉形符号

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陶符中,“十”字交叉形符号也有数例,可分为直角(垂直)相交(图一:13~16)和斜交(图一:10~12)两种。在垂直相交的刻符中,还有两个“十”字连续相交成为双“十”字(图一:15、16),从构形上看,很像简化字的草字头“艹”形。

单纯的“十”字垂直相交构形的陶符在已经发表的材料中是比较多见的,如西安半坡陶符<sup>[29]</sup>、铜川李家沟陶符<sup>[30]</sup>、临潼姜寨陶符<sup>[31]</sup>、蚌埠双墩陶符<sup>[32]</sup>、良渚文化陶符<sup>[33]</sup>、城子崖遗址陶符<sup>[34]</sup>、半山马厂陶文<sup>[35]</sup>、藁城台西陶符<sup>[36]</sup>、清江吴城陶符<sup>[37]</sup>等。这种“十”字正交叉(垂直)的陶符,在殷墟陶文中也有多例发现,李济认为殷墟陶文的此类构形(9~15,《殷墟陶器研究》中陶文的编号,下同),均当释七,卜辞七作十(《后》上·五·九),或作十(《后》下·九·一),大抵横直二划,长短参差,甲作十,则二画等长,此其别也。间亦有七字两画等长而甲字两画反有参差者,则可以上下文义别之,金文亦然,但仍以甲字两画等长,七字两画参差者为正体也。此数文(殷墟陶文9~15)横直二画相差颇大,且为单文,当以释七为是也<sup>[38]</sup>。那么,从形体上看,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此类陶符,很有可能是后来汉字“七”、“甲”等字的祖形。

斜交的“x”形陶符,不管其倾斜程度如何,只要不是垂直相交,都可以归于一类。这类陶符也是比较多见的。如西安半坡陶符、临潼姜寨陶符、乐都柳湾陶符<sup>[39]</sup>、扬家湾陶符、蚌埠双

墩陶符、良渚文化陶符、半山马厂陶文、二里头遗址陶符、清江吴城陶符、藁城台西遗址陶符、西樵山文化佛山河宕遗址陶符<sup>[40]</sup>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于省吾就指出“x”形陶符可能是汉字中的“五”<sup>[41]</sup>。殷墟出土的陶文中也有两例(5、6)此类符号,李济也把它们释作“五”。我们认为,能不能释作“五”还可以再讨论,但是如果单从字形上判断,“x”形确实和甲骨文、金文中的“五”字形体“X”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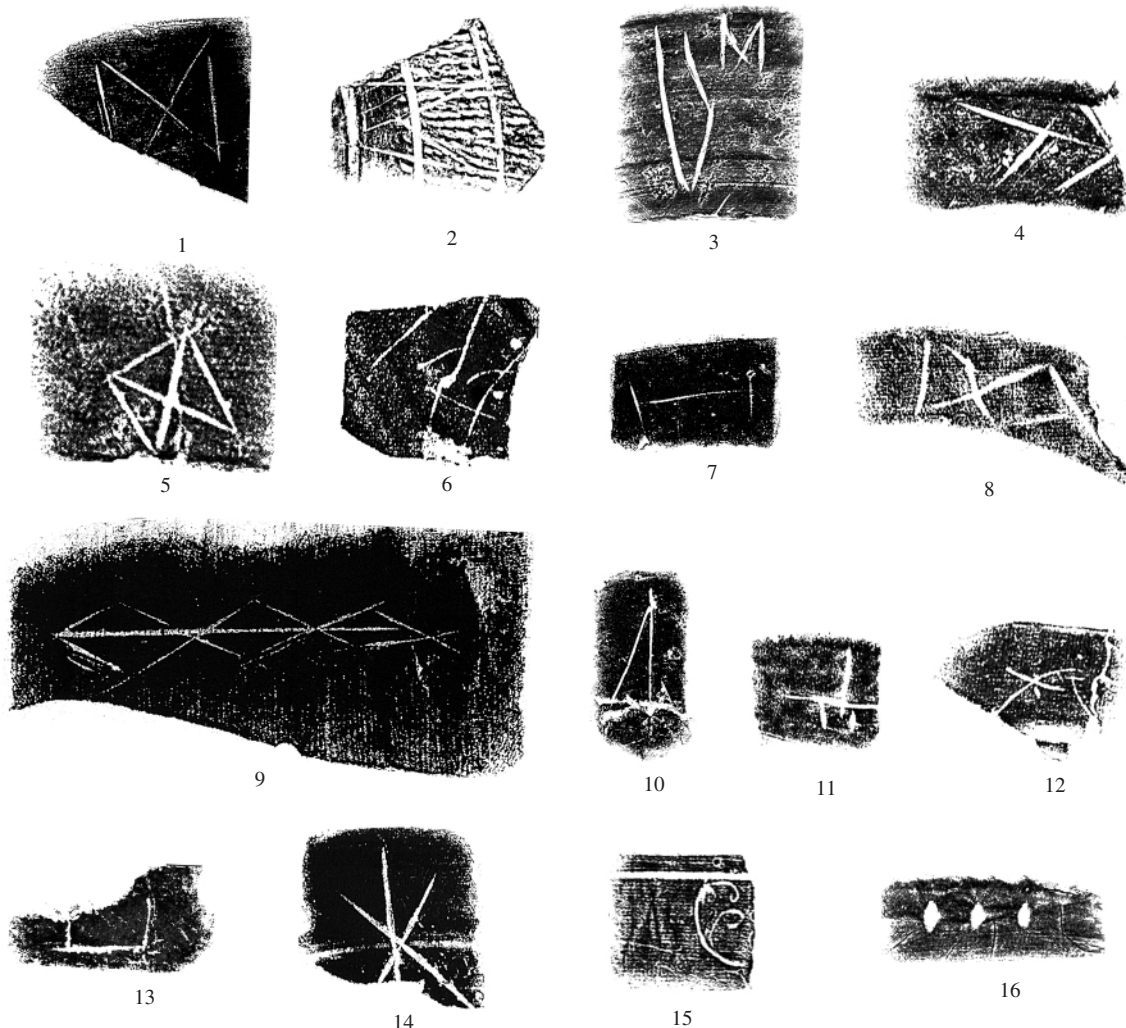
双“十”字交叉符号,在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两例,这类符号在其他遗址中也有发现。如乐都柳湾遗址陶符、临汝北刘庄遗址陶符<sup>[42]</sup>、二里头遗址陶符、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陶符、城子崖遗址陶符、侯马牛村遗址陶符<sup>[43]</sup>等。由于两个连接的“十”字交叉共用一条线段,所以这类陶符可看作一条直线穿过两条短横线或两条线段标识在一条直线上来理解。如果按照前者理解,则此类符号似乎能够表达一种穿透某种具有一定厚度物体的意义;如果是后者,则又可以理解为两条短横线是用来确定从线条上截取线段的长度的端点。陶盆(99ZX H63:9)口沿沿面陶符有部分残缺,如果仔细辨认,短的横线似乎是四条,在比较清晰的两条短线的两侧各有一条短线,而且横线似乎也延伸到了它们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陶符似乎是一条直线横穿了四条短竖线,形似栅栏。

#### 五 一至四条平行短线符号

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陶符中,有一些是用短线组成的,或为一条短线,或由两条、三条、四条短线平行排列组成(图三:2~16)。这些符号或许代表数字“一”、“二”、“三”、“四”,或许就是随意刻划的。

#### 六 其他类型符号

大口尊(95GH02:9)口沿内壁陶符(图四:1)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X”形即“五”字相似,只是方向不同。二里头遗址“1、11、111、1111”符号组、柳湾遗址“一、二、三、三、三”<sup>[44]</sup>符号组,让人一看




















图四 其他类型陶符

1. 大口尊(95GH02:9)口沿内壁 2. 瓮(99ZX H31:14)肩部 3. 盆(99ZX H42:36)沿面 4. 簋(00ZX T135④A:88)口沿沿面 5. 缸(00ZX T135④A:407)口沿沿面 6. 盆(95 M3:01)腹部内壁 7. 簋(95 T109⑤:1)腹部器表 8. 簋(00ZX T135④A:547)口沿沿面 9. 大口尊(95GH02:8)口沿内壁 10. 缸(95 H6:58)底部外侧 11. 盆(00ZX T97④A:230)口沿沿面 12. 簋(00ZX H79:8)腹部器表 13. 缸(95 T74④:31)底部外侧 14. 大口尊(95ZX 采:040)口沿内部 15. 簋(99ZX H43:54)腹部器表 16. 壶(00ZX H60:32)口沿部位




便联想到这是表示数字的符号,那么“三”就是数字“五”,如此一来,刻符“三”和“X”、“X”就是表示同一个数字“五”。由于“X”、“X”中部的“十”字斜交有时并不是和两边的平行笔画紧密连接,所以,我们推测“X”、“X”符号中部的“x”或许代替了符号“三”中间的三短横,目的是为了 避免重复书写的麻烦。由此可见,“x”似有填充、代替某一空间的作用。








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陶符中,有两例“M”形符号(图四:2、3)。其中陶瓮(99ZX H31:14)肩部陶符刻划在绳纹背景上,横向作“之”状。由于安置在三道凹弦纹之间,比较模糊,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来。这样的“M”形或其与别的形体组合的陶符,在其他遗址中亦有发现。如乐都柳湾陶符,蚌埠双墩陶符“△”、“△”,二里头遗址陶符“M”,扬家湾遗址陶符“彡”,上海崧泽












址陶符“<sup>[45]</sup>”，郑州商城遗址第八区宫殿区陶符“<sup>[46]</sup>”，清江吴城发现的上下两个“M”形叠置的陶符“<sup>[47]</sup>”，侯马牛村遗址陶符“<sup>[48]</sup>”等。另外，在广西钦州市大寺镇马敬坡遗址采集的商代石铎和石磬上，刻划有 11 个符号，其中有一个符号为“<sup>[49]</sup>”，当是和上举数例刻符相似。这类符号似乎象征“波浪”，或者近于“之”字纹的变体，如果从拉丁字母“M”的视角去观察，又像是表示连绵的山峰，如蚌埠双墩陶符“<sup>[50]</sup>”、“<sup>[51]</sup>”，且甲骨文“丘”字有作“<sup>[52]</sup>”（《殷契佚存》926）、“<sup>[53]</sup>”（《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4896、《南明》395）等形者。不管怎样，这类符号在当初先民刻写的时候，当是带有一定意义的，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就是成熟的文字。


陶簋(00ZX T135④A：88)口沿沿面上的陶符(图四：4)，如果不考虑左下部的一斜笔，剩余部分“<sup>[54]</sup>”则与竹叶状三叶形符号类似，即使将左下部一斜笔综合起来审视，也不乏竹叶状的感觉。照此理解，这个符号似乎就是表示竹叶或形似竹叶的草叶。如果将这个符号旋转，则呈“<sup>[55]</sup>”形，像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甲骨文中就有类似此形的文字，即“大”字。与此相似的陶符亦见于其他遗址。如扬家湾遗址“<sup>[56]</sup>”形陶符、郑州碧沙冈遗址“<sup>[57]</sup>”形陶符<sup>[47]</sup>、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sup>[58]</sup>”形陶符<sup>[48]</sup>，这些符号很像是正面站立的人形。甲骨文中“大”字多作此形，只不过有的字形下部左右两笔稍弯曲作“<sup>[59]</sup>”，而且从这种形体的合体字也不在少数。金文中“大”字亦作“<sup>[60]</sup>”（兄日戈）、“<sup>[61]</sup>”（作册大鼎）等形，容庚认为：“（金文“大”字）象人正立之形。大、𡗗为一字，《说文》分二部，金文只作大。”<sup>[49]</sup>从形体上进行对照堪比，上述人体正立之形的早期陶符、甲骨文、金文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新石器时代的此类陶符是否已经表达了一定意义，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陶缸(00ZX T135④A：407)口沿沿面上刻划的陶符(图四：5)，像是一个连接了“十”字交叉形三面开口的构形。类似的符号还见于其

他遗址中，如佛山河宕遗址陶符“<sup>[62]</sup>”、侯马牛村古城陶符“<sup>[63]</sup>”，似乎是在“<sup>[64]</sup>”形的下部开口又添加了一横笔。

陶盆(95 M3：01)腹部内壁刻划的陶符(图四：6)，左上部和右上部稍有残缺，以致左边一斜笔与主体部分的构成关系不甚明了。如果将这个符号左边一斜笔去掉暂不考虑，则剩下的部分似两个侧立的人形，它们的下部有一条短线横向贯穿。这个构形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并”字。甲骨文“并”字作“<sup>[65]</sup>”、“<sup>[66]</sup>”、“<sup>[67]</sup>”、“<sup>[68]</sup>”诸形。于省吾认为：“甲骨文并字作<sup>[69]</sup>、<sup>[70]</sup>或<sup>[71]</sup>。并字的造字本义，系于从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或两个横划，作为二人相连的指示字的标志，以别于从，而仍因从字以为声（东耕通谐）。”<sup>[50]</sup>

陶簋(95 T109⑤：1)腹部器表刻划的陶符(图四：7)，如果将其作 90° 的旋转，则为“<sup>[72]</sup>”形。与此类似的陶符还见于其他遗址，如乐都柳湾陶符“<sup>[73]</sup>”、扬家湾遗址陶符“<sup>[74]</sup>”、台湾凤鼻头遗址陶符“<sup>[75]</sup>”、山东城子崖上层东周谭国遗址陶符“<sup>[76]</sup>”、平乐银山岭战国墓陶符“<sup>[77]</sup>”等。此符号不管纵置还是横放，都和甲骨文中的天干字“壬”有相似的形体。另外，甲骨文中还有“<sup>[78]</sup>”、“<sup>[79]</sup>”、“<sup>[80]</sup>”、“<sup>[81]</sup>”、“<sup>[82]</sup>”等形的字<sup>[54]</sup>，释为“工”或从“工”的字。但单从字形上看，和释作“壬”字的形体很相似。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被释作“壬”或“工”的字，其形体在新石器时代的陶符上已经见到了。

陶簋(00ZX T135④A：547)口沿沿面刻划的陶符(图四：8)，如果将其竖立起来，则呈“<sup>[83]</sup>”形，似乎是表现一种类似葫芦形的物体。可能是由于在陶器上不便刻划出曲线圆润的笔触，所以才出现这种用短直线代替圆弧曲线的生硬感觉。这个符号的特点是下边一笔并非完全似葫芦形作弧形底，而是平底，所以，又使人想到这是一个能够平置的器物，并非如同葫芦一般得悬挂起来。

大口尊(95GH02：8)口沿内壁上刻划的陶符(图四：9)，由三个菱形和一条横贯三个菱形的直线组成，类似装饰纹。

陶盆(99ZX H42:36)沿面上除了刻划一个“X”形符号外,在“X”形符号的近旁还刻划有一个“\”形符号(图四:3)。

陶簋(00ZX H79:8)腹部刻划的陶符(图四:12),翻转呈“フ”形,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的泥质黑陶平底器(T195H473:3)器底上的刻划符号“フ”相似。李先登认为王城岗遗址的陶符当是“共”字,和甲骨文、金文中的“共”是一个字,而且是相当成熟的会意字<sup>[55]</sup>。

陶缸(95 H6:58)底部外侧刻划的陶符(图四:10),其形体是有一共同端点成锐角向下分开的两条线段。陶盆(00ZX T97④A:230)口沿沿面刻划的陶符(图四:11),像一个带两个分支的叉形工具。陶缸(95 T74④:31)底部外侧刻划的陶符(图四:13),左上有残缺,大体上呈一个凹槽形。大口尊(95ZX采:040)口沿内部刻划的陶符(图四:14),由三条线段相交组成。陶簋(99ZX H43:54)腹部器表刻划的陶符(图四:15),形似一个浪花,又有些像菊花的花瓣。陶壶(00ZX H60:32)口沿部位刻划的陶符(图四:16),由三个并排的点状构成。

综上所述,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发现的陶符中,由线段构成的刻划符号占多数,接近90%,只有少数是线条构形类的符号,即象形符号。通过与其他遗址发现符号的对比,可以看出,这里的陶符具有普遍性,相同的符号在其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说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先民所使用的这些符号已经具有相当广泛的认同度。单从形体上看,其中有些符号已经和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十分相似。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 其中1995年发现的陶符中有7例已经在《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中发表过,即编号为95 H6:58,95 T194④:2,95 T74④:31,95 T109⑤:1,95 G3:25,95 H55:8,95 M3:01的陶缸、簋、盆、豆及罐腹残片上的陶符,在原报告中编号前面没

有“95”。

- [3]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字例略说》,第17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第106~107页,图五五:2,科学出版社,1996年。
- [5]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 [6]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 [7]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68页图五二〇:2,图版四九:1,文物出版社,2001年。
- [9] 季云《葛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
-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与研究》,第458页,第446页图三一四:4,彩版四七:1~3,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以下二里头遗址陶符资料均引自此文,不再注出。
- [12]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5辑,第246~258页,黄山书社,1989年。
- [13] 同[9]。
- [14]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第11~13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 [15] 同[5]。
- [1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17] 李济等《城子崖》,第52~54页,图版拾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4年。
- [18]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 [19]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 [20] 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第164页图九五:27、64,文物出版社,1985年。
- [21] 余秀翠《宜昌扬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以下扬家湾资料均引自此文,不再注出。
- [22]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 [2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 [24] 同[8],第658页图四四九:5、11,第764页图五一六:11~16,第766页图五一八:11。
-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 [26] 李济《殷墟陶器研究》,第272~27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27] 同[19]。
- [28]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第197页,图一四一:17,图版一七〇:6,文物出版社,1963年。
- [30] 同[19]。
- [31] 同[19]。
- [32] 同[12]。
- [33] 施昕更《良渚》,第25页,西湖博物馆,1938年;同[16]。
- [34] 同[17]。
- [35] 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第1册,第178~179页,1934年。
- [3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 [37] 同[5]、[14]。
- [38] 同[26],第185~186页。
- [39] 同[20],第164页图九五:1。
- [40]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以下佛山河宕遗址资料均引自此文,不再注出。
- [41] 同[28]。
-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 [43]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以下侯马牛村资料均引自此文,不再注出。
- [44] 同[20],第162页图九四:6~9、11。
- [4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区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 [46] 熊昭明《广西先秦刻划符号刍议》,《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 [47]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冈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 [48] 同[46]。
- [49]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摩补《金文编》,第693页,中华书局,1985年。
- [50]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57页,中华书局,1979年。
- [51] 张光裕《从新出土的材料重新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雪斋学术论文集》,第293、298~299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
- [52] 同[17]。
- [53] 同[46]。
- [54] 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甲骨文字形表》,第1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 [55] 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周艳明)